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高等教育辩证关系评析

张亚群*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以时代性质来划分的。文化按照渊源差异又可分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按照群体差异划分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按照价值体系和社会势力的差异分为主文化（包括主导文化、主流文化和主体文化）与亚文化、反文化；按照表现形态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包括上层的学术思想，下层的风俗习惯，表层的文学艺术，深层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思维方式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存发展过程中创造、融合和积累起来的文化总和，具有多重文化属性。它既有民族性和历史性，又具世界性和现实性。本文主要从精神文化层面，探析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高等教育之间的制约与促进关系。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制约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因素

文化具有传承性，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存在于过去，还通过种种方式传承于现实之中，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现代高等教育之间存在着潜在深层的联系。传统文化在现实中表现为文化传统和知识形态，作用于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高等教育同样受到这种传统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表现在高等教育的诸多环节中。其中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例如，在高等教育招生环节上，我国大陆现行的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和台湾实行的大学联合招生考试制度，就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制约分不开的，受到了传统文化中大一统观念和科举考试公平

竞争观念的推动和影响。尽管这种统一考试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已为人们所诟病，需要改革完善，但从它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现实社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来看，统一高考制度毕竟利大于弊。^①

在培养目标上，我国高等教育把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全面发展人才作为首要目标，重视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制约和影响。一方面，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历来以群体为本位，以社会价值为导向，崇尚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主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②强调教育以培养“君子”人格和实现“治国平天下”为最终目标；倡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忠贞爱国，兼济天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鲜明的入世精神。这种传统文化精神对于我国当今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制定与实现都产生了正面影响。另一方面，这种传统价值取向又存在轻视个体价值，崇尚尊卑等级观念的弊端，它往往导致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上抑制个性发展，忽视竞争意识和开拓精神的培养，因而使高等教育难以培养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需要的人才。

在办学制度和管理模式上，我国高等教育同样受到传统文化因素正反两方面的制约。自清末引入西方高等教育制度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制度和管理模式几经变革，形成自身的一些特色。

从办学制度上看，我国已建立起一套基本适应国情的独立完整的高等教育系统。如果说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创建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继承和吸收了科举考试平等竞争的优良传统与国外校外考试的经验，表现出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民族文化特色，那么，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民族化进程中，人们对传统的书院精神与科举制的重

* 厦门大学高教所 97级博士生（厦门 361005）

新关注与再评价,则反映了学术界对百年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革成败得失的历史反思。

就管理模式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在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方面侧重于集权管理与行政导向,与欧美国家注重分权管理与学术导向存在明显差异,表现出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影响。受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和权威观念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更容易选择和接受国家政治权威的统一管理。这种管理模式有利于国家运用行政力量监督、调整和控制高等教育的宏观运行,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办好重点大学,为现代化建设培养骨干人才;同时,统一管理有利于保证人才培养的政治方向、目标和质量。其弊端在于高等院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和灵活应变的调节能力,难以调动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当它与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相结合时,就更成为阻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大障碍。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传统文化以正式课程和潜在课程的方式产生影响。前者包括文史哲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以知识形态进入高等教育培养过程,陶冶受教育者的民族情感,提高他们的民族文化素养,促进人才成长。后者包括教育者的价值观、人才观、知识观、教育与教学方式方法、师生关系以及校园文化氛围等,以观念形态进入培养过程,对受教育者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文道统一”、“德智统一”的人才观念,使我国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既注重传授知识,又重视引导学生如何做人,有利于人才全面发展。而“重整体轻个体”、“重积累轻发现”、“重趋善求真”、“重应试轻科学”等传统观念至今仍制约着人才培养,使我国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专门人才往往缺乏独立个性和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没有真正培养出来。

传统文化作为观念形态不仅直接制约高等教育,而且作为教育与经济、政治因素之间的中介,间接影响高等教育。^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归根结蒂是受经济政治发展的驱动,但改革方式和改革进程就明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介的折射影响。如传统文化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④的哲学思想,“过犹不及”^⑤、“和为贵”^⑥的观念,对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政治、经济渐进改革方式和改革途径的选择与实行无疑产生了间接作用。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也受到人们普遍的传统心理因素的制约。

制约作用是广泛而深刻的,轻视或忽视这种作用,容易导致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简单化与片面性,在改革实践上会产生偏差和失误。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只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制约与影响高等教育的文化因素还包括现代中国的主流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亚文化当代西方文化等。马克思主义经过近百年的中国化过程,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已经从外来文化积淀为现代中国文化新的传统,上升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文化和主流文化。^⑦马克思主义对我国高等教育起指导作用。而在国际文化交流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也会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一定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文化传统对于高等教育最终要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⑧因此,我们不能夸大中国传统文化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制约作用。

二、高等教育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从高等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来看,高等教育并不是完全处于被动的受制约地位,它能够“发挥主体的判断与选择的作用”,“主动适应”传统文化的影响。^⑨文化具有变异性,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也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文化融合而发生变异。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专门人才和传承高深文化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促进传统文化变革的重要手段。它通过发挥自身的文化功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选择、评价、融合与创新,从而促进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实现自身创造性的转化。高等教育促进传统文化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通过高校的中国传统文化学科教学,弘扬优秀民族文化。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哲学、教育等人文、社会、自然科学,含有丰富的知识和优秀的文化精神,是高等学校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大学利用自身学科众多、人才密集的优势,能够对传统文化进行广泛而权威性的选择,形成传统文化课程,通过教学活动,使之得到继承和发展。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对于现代高等教育的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高校中国传统文化教学日益发展。目前除了传统的文史哲专业教学,高等学校许多专业普遍增设了大学语文、中国历史讲座、中国艺术欣赏、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传统文化与现管理等一系列有关选修课程。越来越多的高教工作者认识到,应该“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传统的美德、教育思想和方法、以及文学艺术进入学校、进入课堂。”^⑧汉文字是中华文化的结晶和载体,弘扬中华文化首先必须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汉语水平。中国历史教学也是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环节,因为,“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去历史,无从谈文化。我们应从全部历史之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⑨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教学不仅具有育人作用,而且更具有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作用。尽管在科技发展和市场经济冲击下,传统的人文学科受到冷落,但是,加强民族传统文化教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在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二,通过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思想政治工作和校园文化建设,促进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主文化结合。

有关现代中国的主文化问题,学术界有不同认识。^⑩总的来看,经过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大变迁,传统文化已失去昔日的主文化地位而退居其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文化已成为现代中国的主导文化和主流文化,传统文化只是当今主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等学校历来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多元激荡、相生相克的文化阵地。当今高校,马克思主义处于主导地位,贯穿于学校各项工作之中。正确认识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同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需要吸收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人类一切优秀文化财富。高等学校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中国传统文化课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校园文化建设等教育活动,把传统文化精华与现代先进思想文化结合起来,培养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品格的新型人才,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更新改造。

其三,通过高校的科学研究,促进传统文化创新转换。

高等学校,特别是综合性大学,不仅是教学中心,也是科学研究中心,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目前,国内高校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机构数量众多、学科齐全、人才济济;研究范围广泛,涉及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历史、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领域。通过整理、挖掘传统文化资料,多层次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机制、演化轨迹、发展规律、性质与特征、作用与影响,为发展传统文化创造条件。

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处于当代学术发展的前沿,与社会文化联系密切,能够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对传统文化辨析分离,扬弃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旧的文化成份,保留其合理文化内核。对于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发挥积极作用的优秀传统文化,也要进行重新诠释,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例如,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互补,各有所长。儒家的入世精神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道家的“道法自然”,尊重个性发展,重视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辩证思维的传统,佛教哲学的理论思辨精神,经过综合创新,可以转化为当代需要的文化资源。

其四,通过高校的社会文化服务,促进乡村文化的重建。

高校重要职能之一就是直接为社会服务,包括直接为社会提供文化服务。高校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国家制定社会文化发展规划提供参考依据。高校的文化优势能够对周边地区的社区文化发展,特别是对广大乡村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重要的文化辐射作用。

我国乡村文化更具有传统文化色彩,乡村文化建设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关键所在。高等教育在乡村文化重建中能够发挥特殊作用。它不仅为广大乡村培养和输送具有现代文化气息的各类专业人才,而且直接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活动。如近年来兴起的高校送科技知识下乡,帮助农民“文化脱贫”;大学生在参加社会实践中,宣传科学精神,克服陈规陋习,树立文明的道德规范等活动,对乡村文化建设产生积极影响。此外,高校还利用自身的文化智力资源,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与规划。随着我国高等教育通向农村步伐的加快,它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转化作用越来越大。

其五,通过高校的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互补。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窗口与纽带作用日趋显著。高校通过进行中外语言文化教学,翻译介绍中外名著,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互派留学生,从事短期国际学术访问和学术研究,促进了中外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的交流、融汇与互补。中外互派留学生数量日增。至1996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近27万人,分布在103个国家和地区,已有近9万人学成归国。^⑥来华留学生逐年增长,接受留学生的高校越来越多。1996年度,我国289所高校共接受来自152个国家的各类来华留学人员41211人,比上一年增加11.82%。^⑦

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方式、法治观念、科学精神、民主意识等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它能够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中国也有善于吸收及融合外来文化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对于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如个人本位思想,自由化思潮、享乐主义、宗教观念以及形形色色的“殖民文化”,也应保持清醒的认识与必要的防范,努力以我们的民族文化之长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克服西方文化的负面影响。

高校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近年来,高校多次举办有关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儒学、道家、佛学、华文教育等国际学术研讨会,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来华留学生大多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并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出国留学人员也把中国的语言风俗、文学艺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同其他民族文化结合在一起。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中华文化的地位正在上升。华语华文,中国的人文智慧、传统哲学的“和谐”观与“中道”观,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中国文化开始走向国际论坛。当然,也应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还处于劣势,需要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化。在这一方面,中国的高等教育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更新

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文化发展终究要受到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因素制约,文化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改造只能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发展过程。高等教育只有“主动适应”这一过程,才能更好地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透过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高等教育间的制约与促进关系,我们看到,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高等教育的一个制约影响,是我们今天改革和发展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前提;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则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目的。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等教育与文化的辩证关系。□

参考文献

- ① 参刘海峰:《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教育研究》1996年第11期;刘海峰:《为什么要坚持统一高考》,《上海高教研究》,1997年第5期
- ② 《大学》
- ③⑧⑨ 参见《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 138 218页
- ④ 《周易·系辞下》
- ⑤⑥ 分见《论语》、《先进》、《学而》
- ⑦ 范建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光明日报》,1996年9月7日
- ⑩ 龚书铎:《略谈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演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5期
- ⑪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商务印书馆,1994年修订版
- ⑫ 参见郑杭生:《关于当前文化发展模式的几点思考》,《人民日报》,1994年6月9日;高丙中:《主文化·亚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变迁》,《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
- ⑬ 《光明日报》,1997年1月22日
- ⑭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11月6日